

他无养生之道——记没有病历的谢冕诗翁

■古远清

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院长谢冕虽然不以研究华文学著称,但在世界华文诗坛,却是一个闪光的名字。他的朋友遍天下,仅中国台湾地区而论,就有交往多年的诗翁余光中、洛夫、罗门、痲弦、张默和诗媪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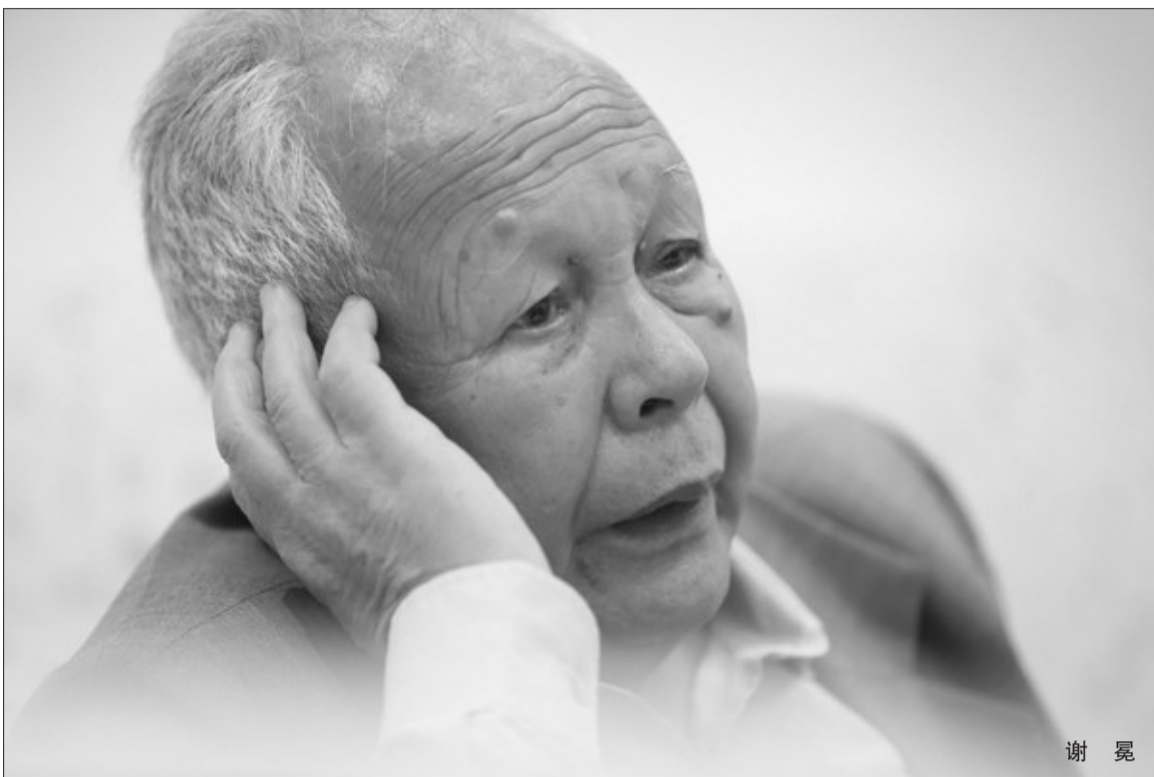
谢冕也是诗翁。他对这个古怪的古远清从辞典里找来的“负有诗名而年事较高者”的称谓,一定觉得怪怪的而拒不接受,因为他现在住别墅,不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更不是柳宗元笔下出世的“孤舟蓑笠翁”。更重要的是谢冕从不觉得自己是老翁,只感到比别人年纪“大”一点而已。的确,“老”会使人想起老朽和老弱病残;而“大”,会使人联想到大有作为、大展宏图和大器晚成。当然,这“大”也和放大厥词有关。

谢冕是何时成为诗翁的?从生理年龄上来说,大概从过半百起,谢冕的头顶就蒙“不白之冤”。后来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而心态却越来越年轻。作为诗歌评论领域里公认的大家,在他的所有学术专著中,诗论占有重要地位,但他的文学贡献决不止于诗歌领域,读读他的《文学的绿色革命》和《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就可看出这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为文学新潮呼号,为文学未来发展把脉和呐喊的评论家。其文学思想的变迁及其鲜活,其文学姿态的多样性,以及谢冕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切关怀和精确判断,人们均可从12卷的《谢冕编年文集》中看出。

在2018年秋天香山饭店召开的“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上,诗媪郑敏因行动不便未能来,孙玉石诗翁也因身体原因无法与会。有道是:惺惺惜惺惺,这次是老翁惜老翁,前排就座的全是80岁以上的老前辈诗论家:孙绍振、叶橹、晓雪、骆寒超、洪子诚、刘登翰、吴开晋、吕进……。其中已过米寿之年,来自台湾的张默堪称老大,谢冕屈居第二。

这次见到的谢冕和以往不同,他装了助听器,不像二年前在澳门大学开会时,他要竖起耳朵听大家的发言。他劝我这位坐“七”望“八”的老翁,也去买一个助听器,以便通畅地交流。在他的助听器上头,只见银发高积,可在香山与他一起漫步,他健步如飞,比谁都走得快。在大会茶叙时,我和南开大学一些诗友决定抛开学院式的话题,“研讨”起86岁的谢冕是不是美男子的问题。

通常说来,文品跟人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文章写得漂亮的人,人品也不差。但写得词采繁茂、诗意盎然文章的人,是否颜值就高



谢冕

呢?这次的与会者,多半是谢冕的朋友,或是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崇拜者。这些人众口一词说:“谢冕不仅文章漂亮,人也长得帅。”我不是谢冕的学生和同事,因而我勇敢地大放厥词说:“谢冕的身材略有瑕疵。论身高,虽然不似我属三等残废,但毕竟不像张炯那样高高在上;论体态,则在‘中部崛起’……”我自认为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评价,可我还没说,旁边一位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学者带头抗议,说我搞的是典型的“人体攻击”也就是人身攻击,另一位日本学者也说“如果谢冕身高属三等残废,那鲁迅岂不成了四等残废了?身高与人的伟大有必然联系吗?”正当我说谢冕坏话引起“国际公愤”、苦恼着知音难觅时,来了一位写过《“知情人”说谢冕》的洪子诚,他无疑最有发言权。犹记得多年前,在南方召开的一次当代文学会议上闲聊时,洪子诚突然声泪俱下“控诉”谢冕封杀他的写诗才华。那是诗情喷发的年代,洪子诚与谢冕相识在1958年底1959年初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时候。这时洪子诚向北大的学生刊物《红楼》投稿,可他累投累败,累败累投。而当年摸稿件生杀大权的正是该刊诗歌组长谢冕。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早已模糊,他感到谢冕疑似给他写过这样一封先扬后抑的退稿信:

子诚学弟:

你将来可能是一流的学者,但你现在是三流诗人。你想做一流学者又做一流诗人,鱼与熊掌不可

兼得啊。

祝笔健!

谢冕拜

谢冕把学弟贬为三流诗人,难道他自己就是一流诗人?可如果说他是一流诗人,他肯定要“谢冕”,不要这顶桂冠。那他最多是二流诗人,可二流诗人和三流诗人,不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吗?一想到此,收信人也许就不会再与这位“诗兄”计较了。

弹指之间,不再做“一流诗人”梦的洪子诚,当今成了论文累投票中的一流学者,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带头人”。在“研讨”谢冕不够美男子标准的“会”上,想不到他竟是我的知音。他那略带潮汕腔的口音和掺杂有“学术性”的评价,使全场听众大跌眼镜:

谢冕是网派评论家,网派评论家个个都比我们这些所谓网评评论家漂亮,如张炯、孙绍振、刘登翰无不一米八,何况则是美男子。

我说的网派批评家漂亮——除谢冕之外。

真佩服这位一流学者的智慧,不似我笨拙地用写实手法描绘谢冕的身高和体态,以至落得“人体攻击”的恶名。至于谢冕为什么不漂亮,狡黠的洪子诚秘而不宣。在他看来,解释是幽默的裹脚布,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

听了“知情人”这种“言不及义”的评价后,也许有人会觉得谢冕会认为这是当年的“三流诗人”在报复一流诗人。其实,谢冕的心

胸决没有这么狭隘。令人意想不到的,他竟和这位“学弟”也就是“北大幽默协会”的最佳搭档一唱一和:“谢某其貌不扬,世所共知,说又何妨!”

至于南开那位女教授,是谢冕的铁杆粉丝,她认为这位身材适中、“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资深帅哥老得好漂亮,因而当场宣布自己的“两个凡是”——“凡是说谢冕坏话的都是假新闻,凡是说谢冕好话的都是真新闻。”一位女博士生头一次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童颜鹤发,彬彬如也,谦谦如也,总之是毫无老态,充满了青春活力,她竟脱口而出说:“我终于看到了活着的谢冕!”

谢冕就像是一个逆反身体衰老,有诗会有酒有文有书有朋友便万事足的倔强老翁,用《中国新诗总论》《中国新诗总论》等一系列纪念碑式的厚实“砖”著,雄辩地向华文诗坛持续发声。每次开会,谢冕从不衣着潦草,总是西装革履。他一生爱美,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均心向往之。他是那么爱美、景、美文、美食,当然也酷爱美女。《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高雄作者傅孟丽夸说自己的传主“身边的女人都爱他”,这句话对谢冕也完全适用。以这次香山会议而论,会前会后不晓得有多少美女学者争着与他单独合影留念,有的还作亲昵状。像我这位又老又古、又古又老的老古,当然没有这个福份。就连著文嫉妒谢冕“艳遇”,长得像一棵槟榔树的孙绍振,也自愧不如。

作为谢冕多年的诤友,我抓住

这次香山论剑的难得机会,闪电式地“审”起这位大腹便便的诗翁:

“你有高血压吗?”

“不知道。”

“你有高血糖吗?”

“不清楚。”

“你有高血脂吗?”

“无可奉告!”

我感觉到他好像在装糊涂,因而换了一个更酷的“审判”题:

“你得过老年痴呆症吗?”

这时他提高了警惕,感觉问者不善,便作闭目养神状,拒绝作答。

我想他的生理现状,属个人隐私,我后悔不该“审”他,便向谢冕致歉。可他出乎意料地说:“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被人审查过多次。你这次的所谓‘审判’,不过是小儿科。看在多年交情尤其是你编过‘略有瑕疵’的《谢冕评说三十年》的份上,我才回答你前面的‘三审’。不过,身体现状不是隐私问题,而是我真的‘无知’啊。”旁边一位博士生说:“他从来不检查身体。”谢冕接着说:“我是没有病历的离休干部,可从没有花过离休健康费的一分钱。”他在《中华读书报》上写的回忆北大往事的文章,被人误认为他在谈养生,其实,谢冕对养生之道毫无研究。他对我说:“我的健康得益于自信,没有什么养生之道。”

这位经常给中国新诗“开处方”“写病历”的诗论家,自己居然没有病历!这无疑是个悖论。谢冕还自豪地跟我说自己没有住过假新闻,凡是说谢冕坏话的都是真新闻。他吃饭、能睡、能写、能讲、能玩。这次他作百年中国新诗的主题演讲,谈到新诗的坎坷历程时,手挥目送;谈到新诗的贡献尤其是北大的参与时,眉飞色舞。会后由企业家黄怒波也就是诗人骆英举行欢送宴会。这次宴会充分展现了美食家谢冕的“才华”,其酒量简直可用海量来形容,用他的学生高秀芹的话来说,“三盅全会”在他面前齐开。他的食量也大得惊人,他对美食美酒的兴趣让人感到生命的无畏和盎然。他平时吃月饼不怕有蛋黄馅,喝咖啡一定不忘记加糖。他的一位学生请他吃自助餐时,竟一口气吃了十几只生蚝。别人劝他不要吃了,可他说还没有过瘾呢。

当然,谢冕不是某些人笔下的“仙风道骨”。他是凡人,也有小恙,这时他会到药店胡乱地买点感冒药应付。他平时不似许多老年入把药当饭吃,靠药物维持生命。远离保健品的他,现居“乡下”昌平,进城开会要换三次公共汽车然后转乘地铁。我说“坐‘八’望‘九’的老翁,不能再挤公汽了!”他反驳说:“我老吗?谁定的规矩?这规矩对我完全不适用。”

前几年在北大开《中国新诗总论》研讨会,听谢冕的高足黄子平在勺园宾馆用餐时说:“谢老师的长寿秘诀就是不检查身体。”这体现了这位诗翁的自信,当然也体现了他的文化自信。谢冕始终认为:与其相信药物,相信繁琐得令人生厌得来毫无诗意可言的检查数据,不如跟着感觉走,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所具备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使人想到谢冕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我的“反季节”写作》:

尽管我的季节已届深秋,我知道接着来的就是让人惊悚的冬日。人生百年,所有的人都无法躲过那最后一击。然而我依然迷恋于人间的花朝月夕。

据心理医生说,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众多不良因子中,烦躁情绪与郁闷心境最易引发各种疾病尤其是癌症。而幽默风趣,不仅显出一种文化智慧,而且是一种保健良方。谢冕的幽默,不是带黄的段子,也不是刻意挖苦他人的笑谈,而是一种学问,一种气质,一种魅力。自称没有养生之道的谢冕,和他聊天,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记得他写过一篇散文《咖啡或者茶》。在此文中,他认为人生有两种境界:咖啡境界或茶的境界。前者是指浪漫的,后者是指现实的。在谈诗论文时,充满幽默感的谢冕,属“咖啡的境界”,可在现实中,谢冕的生活充满了暗礁和风波,甚至还有乌云压顶的日子,人人生的一切困苦和厄运,他差不多都经历过。在家庭生活,谢冕则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这时他突然觉得天塌地陷,奔走于毫无遮拦的暴风雨之中,他的心在流血。可他咬紧牙关,没有让这场意外的打击把自己搞垮。

谢冕告诫自己也奉劝他人将眼泪血印“放下!”除不检查身体外,这“放下”也是他展现笑容、抹去一切阴影的长寿之道。虽然普通老百姓无法做到像谢冕那样不检查身体,也不可能进入长寿基因的研究中,但这位诗翁用“反季节写作”的勤奋著述并从中体现人生价值的实践,及其留下肝胆俱裂的悲痛和人生的一切不快“放下”的忠告,却很值得我们玩味和借鉴。

杨翼骥历史讲义的惊喜重现

■乔治忠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往往会与你期不期而遇,那真好似一种缘分,甚至足可产生终生的感慨和欣慰!

2018年8月,我上网浏览,忽然发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早年三种油印讲义拍卖,即王玉哲之《中国上古史》、杨翼骥之《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郑天挺之《明清史》。于是急切下单买下,两天后特快专递送达。初步检视,王玉哲先生于1959年出版《中国上古史》,即在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郑天挺先生的这份讲义未曾出版,但内容叙述,未完全成文,断续间以删节号联结。盖郑老对明清史了然于胸,讲课时自可连贯和完整,且其中引用史料皆注明出处,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唯内容断续、省略,今日则不利于阅读。杨翼骥先生的讲义前半部分,已于1956年即修订出版《秦汉史纲要》一书,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接受采访时说:“杨先生有一部魏晋南北朝史讲义的书稿,当时这部书稿已经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准备刊印,但后来不知为何没有面世”,最终佚失。因此,杨先生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已是失传了几十年,今日重现,令人惊喜,值得珍视。

在杨翼骥之讲义正文首页下角,有钢笔书写的“玮堂”二字,是保

存者署名,经查考乃南开大学历史系1955届大学生姜玮堂(1936—2000),及今网络上尚有姜玮堂之藏书拍卖。姜先生毕业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学术成果丰富,且珍存这套南开大学历史课程讲义几十年之久。笔者认为,这部讲义的油印和装订时间为1956年2月至5月之间,理由是:第一,讲义后附“历史系一年级中国史课堂讨论提纲”,计划于1956年5月30日、31日组织学生举行两次讨论,此为讲义油印时间的下限;第二,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而讲义是大学生手刻蜡版油印而成,其中简体字与原繁体字混用,表明简体字已然推行但未被熟练掌握,因而油印时间不可能早于《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也不会迟后太久。

60多年前的历史课程讲义,到今天是还具有独特特色和学术价值?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初步浏览,即可领略这部讲义在内容安排、思想见识上都颇有别开一格的特点,可概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诚心诚意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方法。1950年代,杨翼骥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从秦汉到南北朝历史的

讲授课程,其讲义的秦汉史部分,于1956以《秦汉史纲要》书名出版发行,被全国高校广泛用作历史学教材,次年即再版。至30多年后的1989年,史学界仍称誉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2页)。讲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部分何独不然?例如对于三国时曹操施行的“屯田”措施,从背景、发起、细则、发展、收效,直至衰废,作出详细有条理的论述,将之视为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的经济基础。着墨之多和分析深入,超越诸多后来篇幅颇大的中国古代史、通史之书。其他对北魏、北齐实行的均田制,亦详为论列,皆体现了唯物史观重视经济作用的思想,也符合历史的事实。对于东晋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分析,归纳为二点:一是南北豪族之间的矛盾,二是皇室与权臣之间的矛盾,三是长江上、下游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这致使东晋虽然几次取得北伐胜利,但终于不能保住战果。这个见解仅仅叙述东晋官员互相掣肘的现象,在认识上显然倍加深入,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取得的结论。

第二,实事求是,不拘旧格。杨翼骥先生恪守记实求真的史学准则,深入探索,实事求是,而不盲目出历史认识的真理,即不拘守以往叙事结构,而作出新的安排与论析。例如在对于三国中吴国经营南方经济发展的业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举出大量史实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三国之前的江南地区,是比北方显著落后的。而自孙吴政权开始,“从此江南成为全中国的重要生产区域……江南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在诸多中国通史、断代史的著述中,虽然也有对三国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叙述,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视野高度评价孙吴政权,论断是如此明确,如此突出,乃是极其独特的。在讲义中,杨翼骥先生还改变了自西晋以来叙述三国历史总是将吴国至于末尾的顺序,采取了先讲曹魏、再讲东吴、最后讲蜀汉的模式,此岂偶然哉?有深意焉!

第三,精研极思,寓卓识于历史叙事的构架之中。杨翼骥先生对待大学历史教学课程,决无半点敷衍之意,而是反复精研极思,早于1949年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拟定中国史史学的讲授提纲,于1953年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之前,

已经准备好从秦汉到南北朝的历史讲义,其后参考学界研究趋向,不断修订,设定历史讲义的内容构架,寓入卓见明识。例如:翻阅这部重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东晋部分没有叙述淝水之战,不免心生疑惑。继续浏览,方知将淝水之战讲述在北方前秦苻坚政权的史事之中,不仅内容详细,而且评析深切。淝水之战是前秦发动的,而前秦失败的后果主要影响的却是北方的局势,东晋不过是政权依旧,统治者上层的内斗依旧,腐化堕落则每况愈下,并无战后振作的表现。前秦在淝水战败后,政权崩析,北方重新陷入分裂与混战状态。杨先生在讲义中引据史料,指出其后几十年间,“岁旱众饥,道殣相望”“人相食,死者大半”“夷夏莫不,人无人性”等记述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此说殊无理据!《晋书》记载前秦自建国即尊崇儒学,将坚更重用汉人王猛辅政,开办学校,发展经济,健全制度,取得“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帮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的成就,因而兼并分散政权,统一北方。在统一进程中虽有战争,但无滥杀记录,这明显优于曹操的行为,何以见得攻入南方就会摧残人民、破坏经济文化呢?

关于淝水之战的研究,1962年之后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且几次形成热点。杨先生此前的讲义中即已具有与众不同的定见,但未参加论辩。在讲义中,不对此战争粘贴是否“正义”之类的标签,仅就战争的发起、战争后果的分析安排位置。淝水之战是前秦发动的,而前秦失败的后果主要影响的却是北方的局势,东晋不过是政权依旧,统治者上层的内斗依旧,腐化堕落则每况愈下,并无战后振作的表现。前秦在淝水战败后,政权崩析,北方重新陷入分裂与混战状态。杨先生在讲义中引据史料,指出其后几十年间,“岁旱众饥,道殣相望”“人相食,死者大半”“夷夏莫不,人无人性”等记述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此说殊无理据!《晋书》记载前秦自建国即尊崇儒学,将坚更重用汉人王猛辅政,开办学校,发展经济,健全制度,取得“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帮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的成就,因而兼并分散政权,统一北方。在统一进程中虽有战争,但无滥杀记录,这明显优于曹操的行为,何以见得攻入南方就会摧残人民、破坏经济文化呢?

作为讲义,从形式到内容来看,还有需要调整和补充之处,经整理出版,当会对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深化,起到促进作用。